

北京文物里的酒文化

壶中日月长

中国人的酒文化源远流长:酒为嘉会之好,觥筹交错,意象万千,回味无穷,饮酒之风历经千年而不衰。酒文化渗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,无论在祭祀礼仪、宴会庆典、文人雅集等场合都占有独特的地位。



西周酒器克盃。

夏商周酒器：为器虽小 而在礼实大

夏代的酒器是酒文化的载体。“为器虽小,而在礼实大”。酒器的演变,可以观照时代的变迁,印证酒文化发展的历程。商周青铜酒器中的主要器形,以用途分,有饮酒器、温酒器、盛酒器、挹酒(取酒)器等。

爵是目前中国已知最早的青铜酒器,出现在中原地区。北京琉璃河遗址发现了西周早期的青铜爵,《说文》中爵的解释为:“爵,礼器也,象爵之形,中有鬯(chàng)酒。”鬯,是以黑黍和郁金香汁调和成的香酒,专用于祭祀或供奉。所以,爵不出现日常的酒桌上,而是祭祀场合。

琉璃河遗址另外的两件青铜器:斚(léi)和盃(hé),也是两种酒器。斚为盛酒器,盃是盛玄酒(水)以调和酒浓浓的器具。王国维《说盃》一文:“盃者盖和水于酒之器,以所节酒之厚薄也。”这两件青铜器的主人被认为名为“克”,所以又被称为“克斚”、“克盃”。它们上面的铭文还记载了 3000 年前用酒以供奉的史实:“周王说,太保,你用盟誓和酒来供你的君王。我非常满意你的供奉,令你的儿子克做燕国的君侯……”

延庆出土 2500 年前的酿酒原料

谷物酿造是我国酿酒历史的开端。延庆春秋时期的山戎古族用过的青铜斚,口部以木塞封闭,斚内有大量酒糟状沉积的炭化粟。粟呈团块状,质轻而疏松,直径约 3 毫米。呈黄棕色的颗粒状物所占比例少,褐色的粉状、小颗粒状所占比例较大。

这些粟粒大部分是被人碾碎的,而不是自然状态下的降解,因此可以断定它们是酿酒的原料。斚中还有大量谷糠碎片,说明酿的不是甜酒或黄酒,而是白酒。这是目前北京所见最早的酿酒原料,距今已约 2500 年。

山戎人既然制酒,自然也能喝酒。是其中的一种饮酒器,盃金铜胎,平面呈椭圆形。上腹内收,鼓腹平底,长边一侧肩、腹交接部位铸圆形环耳一只,以便伸入手指举杯,两短边各有一个小鼻钮。

有这么一枚熠熠生辉的银带钩,穿越了两千年的时光隧道,至今仍迸射着独具魅力的灼灼之光,诉说一段令人歆羡不已的江都王与爱妃的缱绻深情……这,便是静静躺在南京博物院柜橱中的“长毋相忘”铭合符银带钩。该器长 3.7 厘米、高 1.8 厘米,钩体为一形神逼真的龙首形,钩身系银质错金,古朴大气,厚重敦实,线条生动,制作精良考究,图案为流畅的圆涡形云气纹。它类似虎符,左右可分开;两个半扇的内壁,分别以阴阳刻有“长毋相忘”的小篆铭文,遒劲有力。观之即非民间惯常用件,必为皇家贵胄之随身心爱之物。

精巧精致的带钩上,“长毋相忘”的四个字爱情宣言,感动着无数向往真爱、追求幸福的少男少女。“长相思,毋相忘”,是古往今来人们梦寐以求的一份情感、爱情,是人类亘古不变永恒话题。

银带钩虽体量极小,但风格独特,造



“长相思,毋相忘”,是古往今来不变的爱情宣言。

型新颖,发现之后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和追捧。其所阐述的大爱无言的深情内涵,在西汉时期奔放张扬的年代,将内敛含蓄的美好情愫与浓烈真挚的心思寄托在不离身体的配饰上,生动还原了两千多年前恩爱之人相互的爱恋与思念。

带钩在战国中晚期更加常见,出土的传世实物不少。带钩多用青铜铸造,也有用黄金、白银、铁、玉等制成。形式多样,也有采用包金、贴金、错金银、嵌玉和绿松石等工艺。带钩不仅为日常所需要,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。



顺义出土的辽代马镫壶。

从樽杓到注子:煮酒论英雄



辽代注子是盛酒器,上面刻画了当时的饮酒图。

唐代后期,注子(注壶)逐渐取代了樽杓,合二为一,成为最主要的盛酒和斟酒器。“注子”之名,唐代至宋元时期多用,明以后改称执壶。明代李日华《紫桃轩又缀》提到“吴俗呼酒壶为注子……而今人加以长喙如鸟喙然,故名注子。”

古人喜欢温酒,其口感绵甜可口,

不伤脾胃,又得以“煮酒论英雄”。注子既已成为唐代后期主要的盛酒与斟酒器,五代宋辽时人在其基础上稍加改进,加上温碗这个好搭档,即成“温碗注子”,又称“注碗”。

不仅是汉民族,温碗注子也是辽人常见的酒器。草原民族身处寒冷之地,宴饮之时须随时更换温碗内的热水以保持酒温,颇为实用。

石景山发现的辽代越窑划花宴乐人物温碗注子一副。注子腹部的主题纹饰是八人宴饮图,席前陈有酒樽、果盘,主人公手捧酒杯,席地而坐,巧妙地刻画出宴饮的环境与气氛。出土时,注子置于温碗内,可见这两件器物应是完整的一套温酒器。温碗内刻一对首尾相逐的鸚鵡,新颖别致。

辽人的另一种酒器鸡冠壶颇具特色。辽代初期为适应游牧生活,出现了仿皮囊壶形制的鸡冠壶。这种扁平或矮体器身的瓷壶因其提系部位很像公鸡的顶冠而得名。辽中期以后,壶体逐渐瘦长,形似马镫,故又称“马镫壶”。

玉壶春瓶:细颈鼓腹 器型典雅



元代玉壶春瓶。



金代进酒图。

龙潭湖出土的元代玉壶春瓶,细颈,鼓腹,采用贴花和串珠式装饰手法构成覆钟纹和如意云头纹。

玉壶春本与道教求仙有关,用于装仙丹。唐代之后,也用以装酒。唐人称酒多为“春”。唐司空图的《诗品·典雅》中有“玉壶买春”之句。至今仍有“剑南春”等酒名。李白诗《待酒不至》:“玉壶系青丝,沽酒来何迟”。还有人认为玉壶春酒即为菊花酒。《水浒传》第三十七回“及时雨会神行太保,黑旋风斗浪里白条”:“酒保取过两樽玉壶春酒,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”。

宋代之后,主要的贮酒器为经瓶。经瓶以小口密封,短颈,丰肩体长。《正字通》曰:“酒器大者为经程”,经为常规,程是度量衡,经程,即为容一斗酒的标准酒器,后简称为“经”,即经瓶。经瓶的造型使其装酒后头重脚轻,须放在有插孔的酒架上。石景山的金代壁画上绘有进酒图。左侧的侍者持经瓶将酒倒入旁边侍者所端的碗中。

元代以后,经瓶通称梅瓶。元大都出土的磁州窑系白釉梅瓶。肩部在釉下墨书“内府”二字。内府,为皇宫内廷所用之物,类似于现在的“特供”。

通州出土的元代白瓷盘,盘内墨书一“酒”字,十分有趣。笔触酣畅,一气呵成,直指其用。

随着玉壶春瓶的流行,在金银器中也出现了细颈垂腹的注子,除却长流、曲柄外,其形制与玉壶春瓶无异。元代以后,此类玉壶春式的瓶身也成为执壶的主要造型之一。丰台区出土的明代金执壶,造型修长,制作精美,是酒器中的精品。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金漆木雕牡丹如意



这件金漆木雕牡丹如意长 23 厘米,宽 8.3 厘米,高 8.3 厘米,以通雕技法用整块木料雕刻而成,虽经几百年,依旧光鲜如新。该如意造型有别于一般的如意样式,木雕艺人以 3 朵粲然开放的连枝牡丹构形,用两朵含苞欲放的小花蕾点缀其间,形成花团锦簇的样式。牡丹花又称富贵花。3 朵硕大的牡丹花看似一样,又有区别,虽都呈怒放之态,但重重花瓣各具情态,片片轻盈,历历可数,芳香有韵。枝条自然舒展,婉转流畅,仿佛这不是木刻,而是笔画,线条圆润流畅,花形惟妙惟肖,足可见工匠高超精湛的技艺。

(据《内蒙古日报》)

清乾隆款蓝玻璃钺金花卉纹烛台

清乾隆款蓝玻璃钺金花卉纹烛台通高 28.5 厘米,盘径 6 厘米。故宫博物院藏。

这件烛台由海蓝色涅玻璃模制而成,上有铜杆,下为大小两个撇口浅盘,中有立柱,并覆碗式高足等部分组合,其器表阴刻缠枝花卉和卷草纹,纹内钺金,华美精致。

此烛台颜色深沉美观,造型优美,线条流畅,采用了髹漆工艺中的钺金技法,高足上饰弦纹,弦纹之上阴刻填金横行楷书“乾隆年制”四字款。

(据《人民政协报》)



八义窑瓷虎枕



这只八义窑瓷虎枕呈腰圆形,高 8.5 厘米、长 29 厘米,枕面前低后高,角度圆润又柔和,满足了人体枕眠舒适的需求。虎枕外形像一只匍匐在地的老虎,憨态可掬,眉毛浓密,双目圆睁,阔口露齿,尾巴自然地弯曲在腹部,生动有趣。身上虎纹斑澜,用一粗一细的线条搭配勾勒而成,装饰感与写实性浑然一体,相映成趣。虎枕古朴典雅、稚拙可爱,厚实而不失法度,简洁又不乏诗意。最为精妙的是虎枕的排气孔与虎鼻孔巧妙结合在一起,体现出民间工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,是宋金时期陶瓷虎枕杰出代表。(据《内蒙古日报》)

《采莲图》年画承载美好回忆



这幅年画,长 77 厘米、宽 53 厘米,由天津杨柳青画店于 1978 年 9 月出版印刷,售价 0.11 元。画面中,荷花送香,荷叶田田、青蛙欢跳的荷塘里,四个脸庞红润、身体壮实的儿童,正兴趣盎然地在荷塘里采摘莲蓬。这幅年画,构思巧妙,线条流畅,设色工整清丽,画境活泼轻快,且“莲”与连同音,儿童喜庆,莲蓬多子,莲花、莲蓬和儿童组合在一起,有连生贵子的寓意,寄托着后代子孙兴旺的理想。(据《收藏快报》)

“虎釜”



这件“虎釜(yǐng)” ,通高 25.3 厘米,流釜间距 34.5 厘米,肩宽 22 厘米,腹深 13 厘米,盖高 9 厘米,口径 12.5 厘米,重 4.22 千克。器形作侈口,为方唇,短束颈,宽折肩,收腹,圜底,三蹄形足。肩的一侧有管状流,以神形俱佳之卧虎造型。另一侧有龙首螭,盖折沿,盖顶上有踞一猛虎形装饰,盖与釜上各饰有一个小环钮,原本当有链条相接,现已散佚。肩部饰古色古香的卷曲夔纹,腹上部密布横 S 形斜角云纹,腹下部则有一圈瓦纹,足根环饰饕餮纹。“虎釜”的器盖和出水口,皆有虎造型设计,且顶盖内铸有四字铭文,其中前两字“自乍(作)”非常清晰,第三字释读存疑,第四个字为“釜”。从“虎釜”稳健的形状、精美的纹饰、精巧的设计,业内推断它的主人应该是一位有身份的官员。(据《西安日报》)